

百战军魂刘益民的铁血往事



主持人宁澹:本期《党的故事我来讲》(第五季)我们邀请到一位深耕洛川本土历史、潜心挖掘红色故事的文化学者黄玉良老师。他1954年12月出生于洛川县,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,洛川县财政局会计事务所原副主任科员,2014年退休。现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洛川县作家协会名誉主席。著有《土基那些事儿》《洛川的古城老寨子》等多部地方文史著作。

宁澹:在洛川,有一位人民英雄,经历了抗日战争、三大战役、抗美援朝,并屡建奇功,他就是革命先辈刘益民。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位传奇人物。

黄玉良:在近现代的中国革命战争中,抗日战争、辽沈、淮海、平津三大战役和抗美援朝,是最激烈、最艰难,也是对国家影响最大的战事,能参加其中任何一次的人都是革命的功臣。可是,从我们洛川县北故现村出来的革命先辈刘益民,从西北打到东北、从国内打到国外,在民族危亡的1937年投奔延安,随后在东北和日伪军血拼,打完辽沈战役再战平津,围攻过锦州,解放过天津,在朝鲜三八线与美国及仆从军血战155天,在广西崇山峻岭

中清剿顽匪,几次遇险,多处负伤,在团、师、军参谋长的岗位上运筹帷幄、指挥若定。他是洛川黄土地上走出去的铁血男儿,一个足智多谋的军事奇才。

宁澹:刘益民先辈出生于洛川农村,他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、奔赴延安的?

黄玉良:刘益民,曾用名刘秦川,1914年农历正月十八出生在洛川县北故现村一个农民家庭。他小时候在村上读过两年私塾,后到邻村陈家庄上过初级小学。在洛川县南部百益国立高小读书期间,他与洛川早期革命先驱王世泰的侄子王怀玺相识。1937年7月,卢沟桥事变后,全面抗战爆发,经王怀玺引导,热血青年刘益民奔赴延安,经刘志丹夫人引荐,陕甘宁边区负责教育的郭洪涛安排他跟随徐特立去鲁迅师范学习。

宁澹:到延安之后,他是如何开展工作、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?

黄玉良:1937年11月,他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新正县第一区二乡,刘益民晚上教群众识字,白天深入农户,发动群众,宣传抗日,协助乡干部组织自卫军防特防奸,扩大生产,缴纳救国公粮。1938年3月,他进入陕北公学学习,在校期间,经十九队协理员蒋毅、同学党致义介绍,于同年4月11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8年5月,他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,7月1日被批准提前转为正式党员。

宁澹:抗大毕业后,刘益民奔赴抗日前线。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,他经历了哪些战斗考验?

黄玉良:刘益民抗大学习期满,根据组织安排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投身抗战。1939年春,他随萧克司令员和程世才参谋长到达平西抗日根据地,被分配到挺进军司令部通信科任通信参谋。因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并展现出军事才能,党组织对他重点培养。

1940年4月,他被派往晋察冀军区教导团特科大队学习参谋工作;同年11月,转到晋察冀军区抗大二分校参谋训练队学习,任学员班长,被评为全班模范班班长。1941年6月学习结业后,他回到挺进军司令部通信科任参谋,随即调平北十二军分区侦察科任

科长。这一时期正是抗战最艰难的相持阶段,日军疯狂大扫荡,刘益民临危受命组织侦察小分队,在白旗堡地段接应被包围的冀国翰司令员及军分区机关并成功突围,这就是军史上著名的“白旗堡突围战”。

宁澹:在对日伪作战中,他指挥过哪些关键战斗,取得了怎样的战果?

黄玉良:1942年9月,刘益民调关(关)延(庆)怀(来)联合县武装部部长,经历了小营村遭遇战、东庄子村突围战等残酷血战。1943年10月,他调任北平军分区第四十团作战参谋,参与指挥多次重要战斗。他指挥一连在赤城南山伏击战,毙伤日军20人、伪军10人,俘虏伪军12人,缴获轻机枪、步枪、指挥刀等大批武器。1944年9月25日,他带领四十团三连和县大队在崇礼县猴儿山与日寇400余名步兵激战数小时,毙伤敌40余名,俘敌8名,缴获战马、机枪、步枪及子弹2000余发,三连无一伤亡,战果辉煌。

宁澹:抗战胜利后,解放战争打响。刘益民在东北战场,参与了哪些关键战役?

黄玉良:抗战胜利后,决战在东北展开。1947年,刘益民先后任独立第十三旅三十九团、三十七团参谋长,部队改编后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二十二师六十四团副团长。他参与指挥解放北票、两战杨家杖子,歼敌1.2万余人;参加攻占九台门战斗,毙敌副师长以下2000余人,俘敌师长、参谋长以下3000余人,缴获轻重机枪200余挺,火炮数十门。1948年1月,他参与指挥六十四团全歼新立屯守敌,仅用35分钟就攻占核心阵地,共歼敌9000余人,缴获山炮12门。1948年3月整训期间,刘益民因战功被师党委批准记功两次。

宁澹:辽沈战役是解放东北的关键一役。攻打锦州时,刘益民发挥了怎样的作用?

黄玉良:1948年9月至12月,在辽沈战役中,刘益民任二十二师六十四团代理团长,指挥部队攻打锦州,出色完成战斗任务,实现“关门打狗”的战略意图。随后,又率部参与辽西会战,追击廖耀湘兵团。辽沈战役战史《突破敌人防线》一文,详细记述了他指挥战斗的经历。

宁澹:辽沈战役胜利后,四野挥师入关。刘益民在平津战役中,为解放天津、促成北平和平解放做了哪些工作?

黄玉良:1948年12月,刘益民转任四十五军侦察科科长,随四野入关包围京津。为攻克天津,他化装抵近前沿侦察,摸清地形、河流、火力配置与攻城障碍,获取的情报为全军攻击预案提供了关键支撑。1949年,四十五军与兄弟部队激战29小时解放天津,全歼守军,活捉陈长捷。天津快速解放,彻底动摇了傅作义的幻想,有力推动了北平和平解放。

宁澹:全国解放初期,匪患严重。刘益民在广西剿匪中,如何攻坚克难、保卫一方平安?

黄玉良:1949年春,刘益民随四十五军进入广西剿匪。广西匪患猖獗,土匪依山踞险,亦民亦匪,屡剿难除。刘益民在警备司令部工作,并兼任匪情严重的贵县公安局局长,多次遭遇暗杀、投毒等危险。他凭借丰富的军事经验,依靠群众、精准施策,率侦察分队擒获匪首3名,彻底肃清贵县匪患,当地百姓得以安居乐业。

宁澹:抗美援朝战争打响,刘益民奔赴朝鲜战场。在三八线的战斗中,经历了怎样的浴血奋战?

黄玉良:1952年5月,刘益民任四十六军一三三师参谋长入朝,担负西海岸反空降、抗登陆任务。1953年1月,部队进军三八线,与兄弟部队将美军及联合国军钉在阵地前155天,使其寸步难进。在装备悬殊的情况下,部队浴血奋战,打出了国威军威,让不可一世的美军遭受重创。

宁澹:在朝鲜战场,他指挥了哪些重要反击战,获得了哪些荣誉?

黄玉良:1953年5月2日,刘益民建议并直接指挥三九七团反击下勿洞南山,出其不意大获全胜;5月28日,他与师领导共同指挥坪村南山反击战。1953年10月,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他二级国旗勋章。

宁澹:抗美援朝胜利后,刘益民回国投身军队建设与地方工作,又有怎样的经历?

黄玉良:1954年6月,刘益民任一三三师副师长,回国进入第一坦克学校深造;1955年任第一副师长兼参谋长;1956年升任四十六军副军长兼军副参谋长,投身机械化部队建设。1957年入政治学院学习,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二级解放勋章,后任延边军分区司令员。1964年12月转业,任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副院长,参加全国科技大

会时受到毛泽东主席与中央领导亲切接见。

宁澹:特殊年代里,他历经坎坷却初心不改。恢复工作后,又做出了哪些突出贡献?

黄玉良:特殊年代中,刘益民蒙冤受迫害,被批斗、关押、下放劳动三年,但他对党忠诚、信仰坚定。1972年恢复工作后,他任辽宁省地震办公室主任,组建辽宁省地震局并任副局长,牵头成功预报1975年海城7.3级大地震,及时组织群众疏散,极大降低伤亡与损失,避免了约15万人伤亡和50亿元经济损失,创造了世界地震预报史上的奇迹。1978年至1979年,他在中央高级党校学习;1979年10月,率国家地震地质代表团赴朝鲜考察,重访战场,凭吊先烈。刘益民1982年离休,享受副省级待遇,撰写约7万字战争回忆录,珍藏于辽宁省军事博物馆和党史馆。2001年8月7日,刘益民在沈阳逝世,享年87岁。

宁澹:听完讲述,我被刘益民同志的革命事迹深深打动。最后,请您用一段话总结下这位洛川英雄的光辉一生。

黄玉良:刘益民同志历任团、师、军参谋长,军侦察科长、团长、副师长、副军长,打日伪、战辽沈、破锦州、攻天津、剿匪广西、血战三八线,运筹帷幄,屡立战功,多次负伤,大腿曾被敌弹洞穿。从1937年投奔延安到2001年离世,64年赤胆忠心,为国征战。他是黄土地的儿子,是开国拓疆的百战军魂,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,更是洛川人民永远的骄傲!



● 嘉宾黄玉良

薪火永相传 建功新时代 党的故事我来讲(第五季)

吕翔宇:为黄土地立传,任重而道远



主持人胡琛:聆听作家故事,感受文学力量。本期做客《作家说》栏目的,是一名来自基层乡镇的写作者吕翔宇。他的笔触在深沟峻岭间迂回。他常说,要将头顶扎着白羊肚子手巾、疙瘩绑在额前的陕北汉子,以及或红或绿头巾裹在头上的陕北婆姨女子们的拼搏往事、悲欢离合、憨厚热忱凝字成书。吕翔宇著有中短篇小说集《戏子匠》,这本书里的人物都是他在基层工作中遇到的。让我们一起走进《戏子匠》,走进吕翔宇。

胡琛:您是一名体制内公务员,很好奇您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路的?您写作热情的来源是什么?

吕翔宇:11年前,我从县里到乡镇工作。在我包抓的那个村里,有一段很长的秦长城遗址。我常常坐在山岭上一处破旧不堪的烽火台上冥想:或许世界在农者眼中就这么小,只要谙熟农事,就足以去应对一切。人人都那般从容,在困苦面前从不造作、从不呻吟。又或许,他们早就领略过世界的绚烂,参透了世间的困惑,才选择了这一方安宁。是他们的淳朴和吃苦精神打动了。他们的祖先从不知何时起,就在这里开垦了土地,就这样“骑”在犹如马背的秦长城上,拽着它褐黄色的鬃毛,挖出土窑洞子,在石板炕上延续香火,世世代代。生活的

苦焦,稼穡的艰辛,在老老人用锄头揭开、隆起道道土梁划定耕作界限的土地上,在头顶扎着白羊肚子手巾、疙瘩绑在额前的陕北汉子眼中,这苦焦与艰辛只不过是一顿家常便饭罢了。因此,我决定要用文字记录他们的故事。

有些同事调侃说,我们把青春丢在了山岭上、沟壑里。我不得不重申:不是我们把什么例如叫青春的东西丢在了那里,事实恰恰相反,是我们从那里带走了许多东西,比如一样叫“情怀”的东西。

胡琛:我看了您的小说集《戏子匠》,您最满意的是集子里的哪一段故事?

吕翔宇:中篇《戏子匠》。用4万多字来叙述一个秦腔名伶悲凉的一生,显然微不足道。我绞尽脑汁,构思出符合逻辑的千丝万缕,来服务一条年深日久的真实故事主线,确实不堪重负,最终匆匆收笔,把交代不完的内容写了个后记。

我不愿写杨秀英再次疯了以后的事,就在后记里交代了一些。我收笔以后所发生的故事,才是向我口述杨秀英故事的几个朋友亲眼见到的。之前关于杨秀英的种种,他们也是听老人们说的。他们说,杨秀英蓬头垢面,无论冬夏都是单衣薄裤,拄一根桐子棍,端一个讨吃碗,谁给她吃食,她就为谁唱秦腔。人们都知道她曾是秦腔名伶,可无论怎么诱惑她,她都不再唱一句秦腔了,许是秦腔伤了她的心吧。

初见杨秀英时,我坐在车里,刚和村支书下完乡。支书有些反常,偏转头,几乎顾不上正握着的方向盘。我就问他,那个农村老婆子是他什么人?他告诉我:她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名的戏子匠。就在那一瞬间,我萌生了写一个中篇的念头,题目就叫《戏子匠》。支书是我采访的第一人。但我迟迟未动笔,一直到五六年后才着手。原因有三个:其一,对于秦腔这门艺术知之甚少,只停留在儿时与奶奶赶会看大戏,那时其实我们都听不懂,只是大眼瞪小眼,小眼瞪大眼,我问她唱了个啥,她只说,声音亮得很,衣服花得很,摊场红火得很。其二,支书讲述得不够全面,大都是围绕她过去多俊、多美,他们一群娃娃都爱撵上看,但谁也不敢靠近。再就是说她唱戏那会儿有多少人围观。总之立不起框架。其三,我那时主要精力是在长篇小

说《黄土地》的初稿创作上。后来《黄土地》初稿完成,总觉得千疮百孔,就决定从短篇小说、中篇小说练起。

胡琛:您是怎么攻克这三大难题的?

吕翔宇:首先得恶补秦腔知识,我选择了秦腔通作家陈彦的两本书《主角》《喜剧》,后来又看了介绍京胡名伶的一本《往事并不如烟》,才算是有了点专业知识支撑。接下来就得找了解杨秀英的人来采访,几经周折,我找到了她第二个男人吕文怀的干儿子。沟通后,他很热心,专程回去了几次,最后,他带着完整的故事,向我讲述了杨秀英的一生。我拧住笔帽,满脑子都是杨秀英抖动手袖,站在戏楼中央唱大戏的样子。她的样貌美丽,她的命运悲惨,似乎只有美丽和悲惨叠加在一起才能成为悲剧,才能成为艺术。

胡琛:您能讲讲小说集《戏子匠》里的其他人吗?您为什么要写他们?

吕翔宇:比如,《上访的女人》这个中篇小说。在农村,我见过太多贤惠温婉的女人变成歇斯底里的样子。她们每一个都很相似,都有诉求,都有着莫大的冤屈,都有着不是我们造成、亦不是我们能去解决的问题。她们带着风愿来找我,我们也努力过,试图寻找过办法,但往往徒劳。

都说女人是水做的。这里面有善变,可圆、可方、可扁,可以成为世间一切的形状;这里面有刚毅,冻成坚冰,便是利刃;这里面有温婉,似水柔情,四溢开来,情多得宣泄不完。这些个性里面又有必然的联系。从生活中诱发出来的一系列催化剂,圆了善变的个性,成了刚毅抑或温婉。小说里这个叫屈银花的女人,用她那掉线的眼泪向我们诉说她所遭遇的不幸。让我喟叹女人和女人的眼泪。这两样东西是有威慑力的,会渗透,会发酵,会在半夜叨扰你,既让你喟叹不幸的女人有多么不幸,又让你气愤窝囊的女人有多么窝囊。在屈银花的故事渗透、发酵后,总有一种思考伴随着我——她是怎么熬过来的?

胡琛:那她是怎么熬过来的?

吕翔宇:我相信,这样一个懦弱的女人,在没有遇见那个把她变成歇斯底里模样的男人之前,一定是温婉的。她一定想象不到,自己日后会变得那么“强大”,成为一把利刃,才能够从悲凉的事中煎熬出来。

这个女人和她的眼泪啊,总是唤我去思考。这是我写人物的一个习惯:总要对着入座,想明白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,或者什么样的人贸然做了什么事是为了什么。

欢快、疾驰、跳跃,这一类人的人生命运很少出现在我的笔下,往往那些凄凉、凄惨、不幸的人才会成为我的素材,成为我灵感的源泉。我不是一个悲观、伤感的人,恰恰因为我不是,我才会被那一类人的境遇抑或说命运所震撼,所以我不得不慎重又慎重地去思考——她、她们是怎么熬过来的?

她每次都用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午把故事的某个阶段讲完,讲完就走,一点都不含糊。诉说完毕,舒畅了,走了,她却忘记了她是来索要的。

胡琛:您在创作这些人物的过程中,难点是什么?

吕翔宇:我在一篇小说的前言中这样写道:钻营好架构,提笔时叙述者犯了难,难的不是徐徐淌出的笔墨无法将支离的往事还原,难的也不是鲜活的人物在变成精美的铅字后撑不起读者的兴趣。难的是心携着的,对生活在如此苦焦村庄人群的,那一颗虔诚之心不能跃然纸上,还有那一阵胜似一阵的震颤,不能呼之欲出。

胡琛:刚才您提到正在写长篇小说《黄土地》,请跟我们说说这部长篇小说。

吕翔宇:初稿接近30万字,这里面的辛苦我很清楚。我相信每一个文学爱好者都是精益求精的,虽然我舍不得摒弃它们,但为了让它有血有肉地呈现出来,最后一字未取。

第二稿我加大了阅读量,尤其是农村题材的小说,我要在优秀作品里学习人物的塑造。当我看到作家李佩甫在《羊的门》里塑造的老支书呼天成时,又动摇了,接近9万字的第二稿我决定不用了。

现在我将长篇小说的名字及人物的名字统统换掉了,力求从起名时就构架出内容来。我把小说名字改成了《芒种》。二十四节气里的一个。这是一个可收又可种的节气,正好符合我小说的内容,随着时代的发展,新型农人的出现,以及迎合陕北巨变的一个起始。

胡琛:您的新长篇《芒种》目前遇到最

大的挑战是什么?

吕翔宇:长篇是系统性的,繁杂且冗长,它不同于中短篇小说那样明快单一,需要驾驭太多人物,作者一会儿成为这个,一会儿又成为那个;成为这个时候,又不得成为构架起这个的另外一个。第一个大挑战就是人物的饱满。

我的长篇阐述的是世纪之交发生的故事,陕北迎来空前发展的契机。举个例子,吴起县退耕还林、以粮代赈的出现,大量土地变成林地,大量农民不得不离开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而从事其他劳作。还有禁牧,这要转变多少农者世代半农半牧的思想根源,这里面的故事道不尽、写不完。第二个大挑战就是如此大的块头我能不能啃得动。

胡琛:期待您的长篇早日付梓。您还想给读者和新人写作者说点什么?

吕翔宇:站在一个写作者的角度,我们广袤的黄土地,我们纵横交织的沟壑,我们拼搏不息的汉子,我们善良质朴的婆姨,都应附着在墨迹上变成一部部传世的纪录片。他们斗天、斗地的精神值得推崇,那一定是激烈的,如此激烈斗争的人物内心需要塑造,如此敢为人先的模范榜样需要变得有血有肉,如此宏大的有感染力的主旋律需要文字来展示、传递继而推广。所以,写作者任重道远。



● 嘉宾吕翔宇